

● 严国群 编著

中外 败将评传



国防大学出版社

中外败将评传

严国群 编著

国防大学出版社

责任校对 张国安

吴 静

中 外 败 将 评 传

严国群 编著

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新科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: 10.25 字数: 230千字

1987年12月第一版(北京)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统一书号: ISBN 7-5626-0040-6/E·23

定价: 2.40元

前 言

写败将，难。

中国有句俗话，叫做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。军事舞台上的“王侯”，自然是指那些“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”的胜将，他们的赫赫战功，他们的足智多谋，他们的坚韧不拔，以及他们的其他突出优点，常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他们名垂青史、流芳百世，实属应该。那末军事舞台上的“贼”呢？无非是指那些折戟沙场、城破兵败、被俘被杀、或逃或降，永远销声匿迹的败将们了。他们更多地是以陪衬的角色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这些败将或许有过赫赫战功，或许也曾足智多谋，或许亦是坚韧不拔，或许有过其他许多的优点，但是在胜将们的面前，他们却相形见绌，不为后人所欣赏。年长日久，人们便会逐渐地、或多或少地遗忘掉他们的长处。于是，若想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去翻一翻他们的生平，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建树、造诣，那就十分困难了。此其一难。

历史是公正的，但人们的观念也有变形的时候，尽管这种情况非常特殊。君不见，有些败将战绩平平，军事谋略、指挥艺术、将道修养皆居平庸之流，应当说，这样的将帅不值得歌颂。然而他们却被吹得十全十美，甚至被贴上“神爷”的标签。还有些将帅或功首罪魁，或功败垂成，他们总还是有功的，但千百年来，他们的过失时时被人提起，而他们的功

绩、成就却得不到公认。于是，要想还这两类将帅的真实面目，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此其二难。

难是难，败将应当写。

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，胜与败是不可分离的一对矛盾体。它们互为对象，互相依存，没有失利也就没有成功。如果只研究胜将的成功经验而不研究败将的失利教训，就很难揭示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。胜将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财富，需要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恰当的继承，而败将的教训同样是一种财富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种用更多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财富更为宝贵，也需要加以科学的总结，让它成为后人的一面“镜子”。

有的朋友在看完本书目录之后可能会问：怎么把汉尼拔、拿破仑这样的世界名将也纳入了败将之列呢？所谓名将，是指有名、出名的将帅。据辞典释义，有名或出名，乃指“名字为大家所熟知”。按照这个划分标准，胜将中有为大家所熟知者，当属名将无疑，而败将中也有“名字为大家所熟知”者，这些败将同样可以跻身于名将之林，既是名将也是败将。

有一种偏见，那就是一讲到败将，就以为只有教训可论而无经验可谈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对胜将要一分为二地看待，对败将亦应如此。而且，对于败将的研究比对胜将的研究要复杂得多。因为同样是败将，有的是功大于过，甚至是虽败犹荣；有的是功过相当；也有的是过大于功；还有的是过失累累，无功可言。因此笼而统之地全盘否定败将显然是不公正的，而武断地说败将的功绩是支流，失误是主流，也是不恰当的。

以上，就是写这本评传的基本着眼点。

本书的撰写以正史为主要依据，同时参考了一些专著的研究成果，主要有：军事科学院的《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》、《中国近代战争史》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军事卷》，牟安世的《太平天国》，史式的《太平军在四川》，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商务印书馆的《外国著名战争》合订本，美国小戴维·佐克、罗宾·海厄姆的《简明战争史》，朱杰勤的《亚历山大故事》、宋昌宜的《火与剑的海洋》，美国欧文的《华盛顿传》，苏联塔尔列的《拿破仑传》，英国富勒的《西洋世界军事史》等等，在此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谢意。

作 者

1986年10月定稿于北京西山

目 录

1、成得臣	1
2、庞涓	11
3、骑劫	21
4、赵括	25
5、陈余	34
6、项羽	46
7、吕布	73
8、袁绍	82
9、关羽	97
10、马谡	114
11、陈叔宝	121
12、薛仁果	132
13、张巡	138
14、陈友谅	147
15、石达开	157
16、大流士三世	182
17、汉尼拔	198
18、庞培	222
19、布果因	244
20、费仑纽夫	255
21、拿破仑	271

成 得 臣

成得臣，字子玉，出生年月不详，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可考。《春秋左传》记载成得臣，是以“秋，楚成得臣帅师伐陈，讨其贰于宋也”的文字开始的，这次军事行动发生在公元前637年，由此推断，成得臣至少在楚成王三十五年时便为大将了。

成得臣率军攻陈身兼军政要职，袭占了焦（今安徽亳县）、夷（今亳县东南70里）两座城邑，扶植了顿国（今河南项城县西）后即班师回朝。楚国令尹子文对成得臣的战功十分赏识，便自动辞去令尹一职，向楚成王推荐子玉任令尹。令尹官职系楚国独创，为楚国的最高官职，执掌军政大权^①，比起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的相国来，虽然二者均是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官职，但相国只管政事，不管军机大事，而令尹统管军机、政务，权力要大得多。

子文让位，楚国大夫叔伯极力反对，他质问子文：为什么要让子玉任令尹？子文回答说，我是一心一意为了楚国的强大，有大功者若不委以重要的官职，这样的人有几个能担当安国的大任呢？子文毫不动摇自己的决心，终于让子玉当上了令尹。

晋国公子重耳避难在外，于公元前637年冬来到楚国，

^① 《辞海》缩印本第715页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。

楚成王给予热情隆重的接待。闲谈时楚成王半开玩笑地对重耳说：“公子若返回晋国，以什么来报答我呢？”重耳回答：

“男女奴隶，玉器帛缎，你大王是不缺的；鸟羽旄牛、象牙牛皮，贵国都能生产繁殖，至于楚国用来招待我们的东西，都是大王享用不完的积余，哪里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报答大王呢？”楚成王对重耳的回答不满足，又追问道：“难道真的无法报答我了吗？”重耳见成王紧追不舍，便直率地说：“如果托您的福，我能返回晋国的话，将来一旦晋楚两国兵戎相见，遇于中原，晋军一定退避三舍，以谢楚国对我们的恩惠，如果楚国还不罢兵的话，晋军就只能以兵对兵，以将对将，与楚军周旋了。”春秋时军队一日行程大约30里，称为一舍，退避三舍，即为退避90里。重耳的话不卑不亢，楚成王听了倒没什么反感，却气坏了令尹子玉，他劝楚成王杀掉重耳，以免这无情无义的晋国公子有朝一日即位后对楚国恩将仇报，楚成王不许，说：“晋公子志广而体俭，文而有礼。他的随从也都有才能。现在的晋惠公内外不得人心，晋国已经衰弱了，晋公子早晚会即王位的，这是天意，违抗不了，谁要违抗，必遭大祸。”楚成王依旧款待重耳，又将他护送到了秦国。周襄王十七年（公元前636年），秦穆公助重耳返回晋国即位，称晋文公。

重耳在晋国即位之时，正值楚国的鼎盛时期。楚文王时，楚国攻占了申（今河南南阳北）、息（今河南息县西南）、邓（今河南漯河东南）等地，又迫使蔡国（今河南上蔡西南）臣服于楚。楚成王即位后，趁齐国失去霸主地位之机，楚国又趁机北上，控制了鲁、宋、曹、卫、陈、郑、许、蔡等许多中小诸侯国。公元前638年，楚军大败宋军于泓水，打开了通向中原的大门。

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19年，耳闻目睹了各个诸侯国盛亡兴衰的景况，增长了政治、军事才干，更为重要的是网罗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能人贤士。所有这一切，为重耳振兴晋国、争霸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晋文公即位不久，周襄王的兄弟叔带作乱，晋文公率大军屯阳樊（今河南济源县东南），以右军围攻叔带及狄人，以左军迎周襄王。4月3日，杀叔带于湿城（今河南武陟县），周襄王返回洛阳。晋文公由于勤王有功，襄王赐阳樊、温（今河南温县西）、原（今河南济源西北）、钴茅（今河南修武县大陆村）等地给晋文公，晋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声望大增。接着，晋文公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并对军队进行了调整、扩充，变原来的左右二军为上中下三军。经过晋文公几年的苦心经营，晋国大治，国力增强，急需向外扩张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楚国发生冲突。晋文公为了孤立楚国，采取了联合齐、秦，亲和戎狄，打击楚国的战略。从此，楚国与齐、秦、晋等国的矛盾日益加深。

周襄王十八年（公元前635年），晋国按照既定方针，出兵助秦伐鄆国。楚国为救鄆国，出兵屯守鄆国都城商密（今河南淅川县西南），被秦军击破。秦军俘楚将申子仪，息子边后即还师。成得臣率师追击秦军，没有追上。是年秋，成得臣击灭夔国（今湖北秭归县东）。

到了周襄王十九年，各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的态势有了变化，其中发生了与楚国利害攸关的两件事。四年前惨败于泓水，表示臣服于楚国的宋国，背楚从晋，使得楚国又增加了一个大敌，无疑对楚国争霸中原非常不利，因此楚国不能容忍宋国的背叛，是年冬，楚令尹子玉、司马子西率大军伐宋，围闵（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）。几乎与此同时，

楚国控制下的鲁国与莒、卫国结成联盟，对齐国构成了威胁。齐国当然不会等闲视之，便数次出兵攻鲁。鲁在春秋初期只是一个中等诸侯国，无法与齐国抗衡，只得向楚国求救。这样，楚国又出兵援鲁，攻占了齐地谷邑（今山东东平北），暂时稳住了鲁国方面的战局。子玉、子西在宋地的作战行动进展不大，楚成王遂于第二年亲率楚、郑、陈、蔡、许等国的军队围困宋国都城商丘（今河南商丘南）。楚国大军骤至，宋都岌岌可危，宋成公告急于晋文公。

晋国大夫先轸力主“报施、救患”，即立即出兵救宋，以报宋襄公当年赠名马于重耳之恩，同时也是“取威定霸”的好机会。狐偃则认为，“楚国始得曹，而新婚于卫，若伐曹、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、宋免矣。”晋文公认为这一策略较为稳妥，便于周襄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632年）正月屯兵于晋、卫边境，向卫国提出要假道伐曹，卫成公自然不会答应。晋军迅速回师，从南河（今河南淇县之南、延津县之北）渡黄河直攻曹、卫，正月九日取五鹿（今河南清丰西北），又占欽孟（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，与齐国结盟修好，卫成公也想入盟，被晋文公拒绝，继而卫成公又想投靠楚国，引起内乱，成公出奔至襄牛（今山东范县），晋国于2月攻占了卫国全境。晋文公一鼓作气，又南下进攻曹国都城陶丘（今山东定陶西北），俘曹共公，灭曹。

卫、曹两国距晋近，距楚远，因而当晋军席卷卫、曹时，楚国来不及作出反应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附属国被晋军击灭。

楚军攻宋越来越激烈，宋使门尹般告急于晋文公。文公犹豫不决，认为如不救宋国，则宋国必然降楚，如果请楚国撤军，楚成王又不会答应，晋国若与楚国交战，齐、秦观望

不出兵，这可怎么办？元帅先轸献计说，可叫宋国去贿赂齐、秦两国，让齐、秦出面劝说楚国撤兵，一则是以此怒楚，二则是以此补偿宋给齐、秦的贿赂。楚国决不会允许将曹、卫的土地分给宋国，而齐、秦得宋之贿赂当然高兴，又会迁怒于楚国的顽固，到时候不怕齐、秦两国不来参战。晋文公依先轸计。楚成王果然不听齐、秦的调停，齐、秦两国为此而迁怒于楚国，终于发兵助晋攻楚。

落 入 圈 套

晋、齐、秦是春秋初期的大国，又都想主宰中原，三国联盟攻楚虽然各有各的打算，但对楚国来说却是无法承受的。楚成王特别害怕秦军袭击楚国的腹地，亲自从前线返回楚地申，急令大将申叔从齐地谷邑撤军回申，又令子玉从宋国撤兵。他告诫子玉说：“无从晋师”（即不要与晋军交战）。

子玉可不理成王那一套，遣伯棼向成王请战。成王怒，然后又允许子玉与晋军交战，但不肯多派援兵，只是以西广、东宫与若敖的六卒增援子玉。

楚军援兵到来后，子玉自以为胜券在握，便派宛春使晋，提出让晋国允许曹、卫复国，条件是楚军撤回伐宋之军。晋大臣狐偃说：“子玉太无礼了！晋侯为君，只得到宋围之释，而子玉是臣，却得到复卫、封曹两大好处。晋国不能答应他的条件，应不失时机击败楚军。”元帅先轸反对狐偃的主张，认为如果不同意楚国的条件，就等于抛弃了宋国，晋国如何向齐、秦两国交代呢？同时也得罪了宋、曹、卫三国，这种既无礼，又树敌的策略不足取；但是，如果同意楚国的条件，也不是好对策。晋国不如私下允许曹、卫复国，使之与

楚反目，晋则扣住宛春不放，以便激怒楚军，最后一举击破它。晋文公采纳了先轾的建议，扣宛春于卫，复曹、卫，两国立即背楚从晋。

子玉没有料到晋国会使出如此毒辣的一招，不禁愤怒非常，遂不顾楚成王“无从晋师”的告诫，立即撤出围宋的大军，挥师直攻晋军。

晋文公见成得臣中计，便令大军后退。许多将士不解，认为“以君避臣，辱也；且楚师老矣，何故退？”狐偃说：“正义之师为气盛，理屈之师为疲惫，哪里在于时间的久长呢？从前晋文公在楚避难，曾许下‘退避三舍’的诺言，今日退师，是对楚国的报恩，如果晋国食言，楚国就得理，其军队便会士气饱满；如果晋军后退，楚军仍然不放，那就是楚国理亏了。”晋军一退再退，楚军步步紧逼。楚军众多将士都不愿意继续追击，无奈子玉决心要与晋军决战，依然率军尾追不舍。4月初，晋、宋、齐、秦的军队先后抵达卫地城濮，楚军稍后便到，依托险阻的丘陵驻扎军队。

兵 败 自 杀

虽然晋文公亲临前线已取得了几次胜利，但对手都很弱小，现在的敌人是强大的楚国，能否战胜这个对手，晋文公心里没有把握，且楚成王对他又有恩惠在先，因此更是疑虑重重，下不了开战的决心。狐偃猜透了晋文公的心思，便对文公说：“开战呢，晋国肯定胜利，夺取霸业在此一举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晋国打不赢楚国，对晋国的千里江山也没有什么害处。”晋文公又问：“楚国可是对我们有恩惠的哟？”意思是说晋国向楚国开战，那不是恩将仇报吗？将军栾枝回答：“晋国

在汉水以北的同姓三国皆被楚国灭亡了，当初楚国对大王您的厚待，只是小恩小惠而已。思小惠而忘大耻，不如开战。”经过大臣们的劝谏，晋文公才最后定下了开战的决心。

子玉派大夫斗勃给晋文公下战书，晋侯派栾枝回答：“楚君有恩惠于我，没敢忘记，所以退避三舍之地，以为楚军已退，不想楚军竟未退，且跟踪而至，晋军只能从命了，请于明日决战。”

楚军的作战部署是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，并指挥三军；以子西指挥左军，斗勃指挥右军。晋军以先轸为中军元帅，统辖三军；以狐毛为主、狐偃为副指挥上军，以栾枝为主、胥臣为副指挥下军。晋军有战车700乘，兵力约两三万，楚军的兵力与晋国差不多。^①

周襄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632年）四月初四，晋、楚两军在城濮展开了决战。晋军下军副将胥臣以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军的右军，楚右军是由陈、蔡两国的军队组成的，这些弱小诸侯国的军队从来只是起陪衬的作用，战斗力很差，哪里经得起晋军的冲击？因此决战一开始，楚右军被冲散，只剩中军和左军了。接着，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扬起两面大旗，伪作前军主将向后撤退，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，假装下军也正在逃跑。子玉见晋军已有上、下两军开始后退，以为决战进入最后关头，即亲率中军攻入晋军阵中，晋军元帅先轸以中军精锐部队横击楚中军，同时晋军抓住楚军左师孤立之际，狐毛、狐偃各率一军夹攻楚左师，楚军力不能支，左师顷刻之间便大溃。子玉见已失左右两军，再战下去，中军也有被歼的危险，只得急收若

^① 军事科学院：《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》第26页。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。

敖之六卒退出战斗。城濮大战以楚军损失左右两军而告结束。楚成王气得七窍冒烟，派出使者对成得臣说：“大夫如果退回楚国的话，有何面目见父老兄弟呢？”成得臣退至连谷，见成王一直未发赦免令，遂自杀而死。

城濮一战，晋国大获全胜。随即，晋文公献楚国兵车百乘、兵卒千人于周襄王，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（即诸侯之长）；继而晋侯召集诸侯会盟于践土（今河南原阳县西南）。晋国的霸主地位由此确立，而楚国损兵折将，已无力继续在中原争霸了。

主 要 教 训

成得臣作为楚军的最高军事长官，缺乏应有的战略眼光。重耳返回晋国即王位后，便制定了联合齐、秦，亲和戎狄，打击楚国的战略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楚国自恃强大，又以为有恩于晋文公，因此对晋国的所作所为掉以轻心。虽然楚国的重大战略出自楚成王，但成得臣身为令尹，看不出诸侯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变化，不能向楚成王提出恰当的建议，说明成得臣在政治、军事上不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家。楚军伐宋，同时又发兵救鲁，这种两线作战的态势素为兵家大忌；成得臣屯兵于宋都坚城之下久攻不克，使得士卒疲惫；曹、卫受晋国袭击，楚军鞭长莫及，等等，都说明楚军的战略是失策的。应当肯定，当出现晋、齐、秦、宋等国结成同盟一致攻楚的局面时，楚成王终于觉悟到楚国军事战略上的失误，他令楚军“无从晋师”，全线撤退以保楚地安全的战略转变是正确的，成得臣却拒不执行成王的决定，坚决要求与晋军决战，使得楚成王的新战略根本无法实现。成得臣以解

宋围为条件让晋国允许曹、卫复国，看起来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战略：打，则晋国开罪于宋、曹、卫三国，理在楚国；不打，则宋、曹、卫三国免去兵祸，功又在楚国。岂不知晋国以柔克刚，打乱了成得臣的战略设想，使之落入盟友背叛，理屈词穷的窘境。

骄傲轻敌，急于求成，不辨真伪，为敌所乘。在城濮之战以前的百十年间，随着楚国疆域的逐渐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，楚军成为各诸侯国中最令人生畏的军队，楚国能够扩张到中原，与几个主要的诸侯强国争夺霸权，自然是得力于它的军队。特别是泓水一战，楚军一举歼灭宋军主力，军威日盛。成得臣又凭着灭陈的功劳当上了令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楚军统帅的成得臣既忘乎所以，又急于求成，在尚未灭宋的时候就企图消灭晋军主力，以便最后确立楚国的霸主地位。有了这种骄傲轻敌、急于求成的情绪，使成得臣不去仔细察辨敌人的企图，而为一些假象所蒙蔽，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连连失误。晋军“退避三舍”，表面上是履行诺言，实际上是实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战术撤退，以达到激怒楚将，疲惫楚军士卒的目的，同时也是为了寻找更为有利的地形。成得臣却老老实实在按照晋军的企图行动。决战开始后，楚军先失右军，其主力处于非常不利的态势，而成得臣把晋军的佯退视为败退，指挥中军贸然前出，造成左军孤立无援被晋军夹击歼灭的败局。“谦受益，满招损”，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醒世恒言。作为一名将帅来说，牢记这条箴言是大有益处的。成得臣骄傲轻敌，为敌所乘，正是“满招损”的应验。

刚而无礼，不得军心，是楚军迅速溃败的重要因素。楚成王准备伐宋之前，成得臣鞭打7人，以箭穿耳3人，以这种

方式治军看起来很是严厉，实际上刚而无礼，丧失军心。楚国老臣蒯贾就说过：“子玉刚而无礼，不可以治军，如果他带兵超过三百乘（2.5万人），将不可能打胜仗。”城濮之战，楚军在一日之内即遭溃败，证明蒯贾的预言是正确的。

军心背向，足以影响作战的胜利与失败。实践证明，一个优秀的将帅往往能赢得部属的信任与爱戴，号令三军，齐勇若一，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得到充分地发挥；而平庸、蹇脚的将帅决不会有什么威望可言，其治军之道要么姑息迁就，要么刚而无礼，其结果必然是上下离异，军心涣散，这样的军队连起码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。